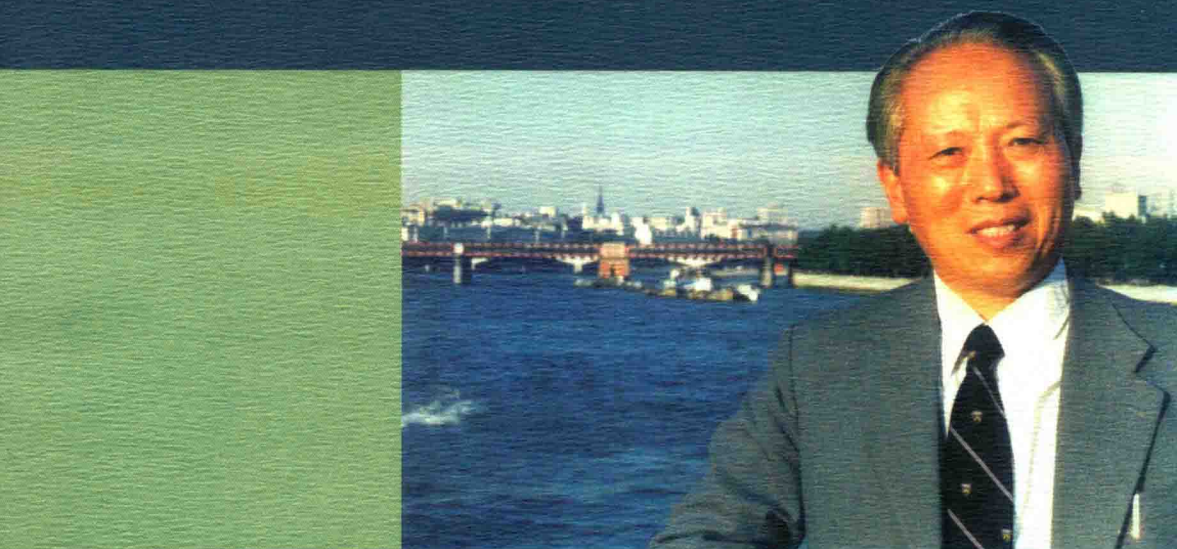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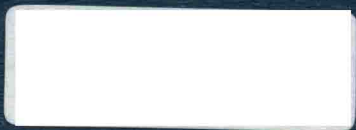


—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



社会史家的学术春秋

蔡少卿 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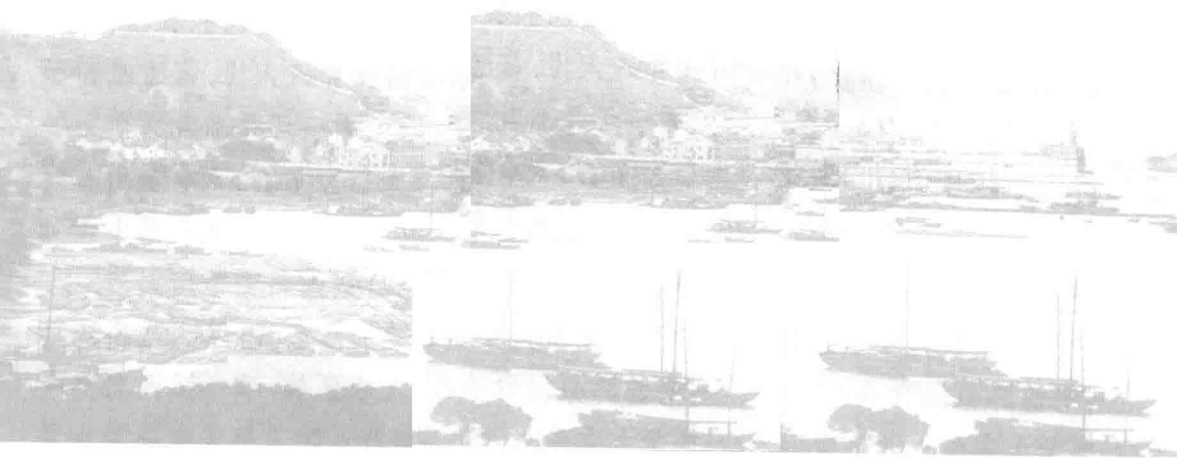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

社会史家的学术春秋

蔡少卿 自述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史家的学术春秋 / 蔡少卿自述, —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6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 张异宾主编)
ISBN 978-7-305-17065-2

I. ①社… II. ①蔡… III. ①蔡少卿-自传 IV.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2925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名家传记丛书
书 名 社会史家的学术春秋
自 述 者 蔡少卿
责任编辑 胡 豪 编辑热线 025-83594071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3 字数 243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17065-2
定 价 60.00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njuyzxx>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我的老师,我的朋友 ——记蔡少卿先生

[美]裴宜理^①

蔡少卿教授是中国顶尖的社会史家之一,对于那些有抱负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他辉煌的学术生涯意义重大,堪称典范。因此,蔡先生孜孜不辍撰就这部信息宏富、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一份珍贵礼物。和蔡师的其他弟子一样,我与先生有过多年的密切交往,从中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但是今天,有了这部回忆录,那些与先生素昧平生的人也能从他的学识和经验中获得教益了。

我认识蔡少卿教授已经快36年了。第一次相识是在1979年秋,其时我刚到南京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那是改革开放以后中美两国恢复学术交流的第一年,并且令人高兴的是,作为华盛顿大学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我有机会在太平天国与秘密社会的关系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南京大学周到地为我安排了两位博学而得力的导师:一位是蔡少卿教授,指导我研究秘密

^①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 Henry Rosovsky 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院士。

社会；另一位是茅家琦教授，指导我研究太平天国运动。

刚到南京不久，蔡先生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和他的夫人潘老师，多次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在无拘无束的聊天中渡过了许多个美妙的傍晚。那时候在中国，外国人还较少被邀请到私人家里去，因而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都非常羡慕我有这种机会，能在这些愉快的场合与蔡先生及其家人进行非正式的交往。

在我们的友谊中，蔡先生当然没有忽略学术的方面。他给我介绍了许多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及其与农民运动关系的有用资料。他将自己从第一历史档案馆手抄来的资料与我分享。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他为我找来了一套关于民国时期白朗起义的资料，当时这套资料还未公开出版。他还为我解释中国学者之间的一些争论，比如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哥老会、白莲教，以及晚清和民国时期其他秘密结社和秘密教门。

南京大学访学一年，给我留下了许多强烈而有趣的记忆，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恐怕还是1980年春我与蔡先生同去安徽淮北的那次田野调查。1978年我在密歇根大学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淮北的农民起义及其与共产主义革命的关系。但在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美国学生还不可能访问中国大陆，因而我的研究是在台北（利用明清档案、国民党档案和调查统计局档案）和东京（东洋文库和东京大学）进行的。几年来，我一直梦想着有机会访问自己论文所关注的皖北地区。这一梦想在1980年变成了现实，因为蔡先生非常慷慨，同意陪我去淮北作一次实地调查。那次访问的地方当中，蚌埠、涡阳和蒙城还未正式对外国人开放。在蚌埠，我们访问了治淮委员会的官员，了解水利给皖北乡村带来的变迁。在蒙城和涡阳，我们访问了农民和当地的史学工作者，了解有关该地区自19世纪中叶捻军起义直至民国时期的民变传统。我们还欣赏了地方戏剧演出，以便对该地区的大众文化获得更清晰的感觉。由于当地大多数农民以前从未见过外国人，我们那次访问引起了当地人极大的兴趣。有好几次，我和蔡先生不得不从众多围观者中夺路而“逃”。

在整个行程中，蔡先生都是研究和旅行方面的极好搭档。我无法向当地

人表达自己的意思时,他便接过话头,将我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白。有时候,当地的被访者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蔡先生便鼓励他们,使他们的态度变得更友好。他尽量使我弄懂所讨论的内容,为我指点许多有趣的沿途景点。我简直想象不出,还有哪位老师比他更细心、更周到了。几年以后,蔡先生再度陪我去皖北时,这种感觉依然一样——这是一次难忘的旅行,去的是凤阳县,调查当地新近实施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我来说,能够观察中国乡村的局部地区,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外国人还无法轻易访问这些地区,它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地区确实非常贫困,但它们非常自豪于以往的历史——作为改革开放的破晓阶段,并为自己未来的可能性而激动。

我与蔡先生的友谊基础,不仅仅是我们在中国的许多讨论和旅行,还包括他在鲁氏基金会资助下,在华盛顿大学渡过的一年时光(当时我还在该校任教)。这一年里,蔡先生选修了几门课程(包括我开设的一门关于农民政治的课程),努力提高英语水平,借助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他还周游美国,在各个中国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并且——或许也是他最难忘的——品味了一阵美国田园生活。通过这次以及随后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多次访问,蔡先生为他在南京大学的学生们带回来了许多信息,使他们得以了解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他将中国和外国学术传统中的精华结合起来,把南京大学的社会史学科建成了著名的研究生培养基地,出版了一系列杰出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高度声望。

蔡先生自己的研究,由于开创性地运用了原始档案和其他档案材料,视野非常开阔(跨越了几个世纪,涉及秘密社会、民间宗教、农民起义、劳工运动、土匪以及中国近代社会史上的其他许多重大问题),分析熟练而富有新意,自然闻名于国内外。但与一些闭门造车式的学者不同,他非常乐于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知识。这些年来,我自己(关于中国劳工运动和农民起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离不开他在资料和阐释上耐心而睿智的指导。蔡先生的鼓励,不断燃起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热情。有蔡先生这样一位良师和老友,是我莫大的幸运。

我把最近出版的著作《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题献给于建嵘教授和蔡先生。在合作研究安源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我和于教授一道前往南京拜访蔡先生，就他本人在上世纪50年代研究安源的情况进行了访谈。那时他还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从我1979年第一次见到蔡先生，到这次南京之行，已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但在和他讨论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仍能感受到跟当年一样的知识亢奋和人格魅力。蔡先生异常清晰而又热情洋溢地回忆了他本人在安源煤矿进行的田野工作，以及在北京对李立三和其他安源工运参与者的访谈。

如回忆录中所说，蔡先生多年来一直鼓励我研究安源，把它作为一个发人深思的重要案例，去探讨秘密社会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因此，有机会在这本书的献辞中向他致敬，以感谢他这么多年来对我学术生涯的巨大帮助，我感到无比荣幸。

我知道，我是在代表许许多多的学者——中国的和外国的——对蔡少卿教授多年来始终如一的谆谆教导表达由衷的谢意。蔡先生将自己作为社会史家的一生编为史册，令后世也能从他的经历和榜样中得到恩泽，这是值得我们庆贺与感激的。

目 录

第一章 早年求学之路	1
一、长江口的农家子弟	1
二、小学时代“大踏步向前”	3
三、抗战沦陷时期的记忆	7
四、大南中学的“试读生”	10
五、因为“通共”被捕	13
第二章 亲历建国初的巨变	19
一、参与学校管理	19
二、抗美援朝运动	23
三、土地改革运动	27
四、镇压反革命运动	33
五、服从安排，留校工作	37
第三章 北大十二年(上)	44
一、考进北大历史系	44

二、见证政治风雨	50
三、调查安源工运史	67
四、承担留学生工作	73
五、下放昌平农村	79
 第四章 北大十二年(下)	84
一、师徒“对号入座”	84
二、揭开天地会起源之谜	89
三、难忘恩师邵循正	94
四、翦伯赞、向达二师风范	101
五、参加顺义农村“四清”	106
六、“文革”初期的北大	111
 第五章 结缘南大	125
一、从盐城机床厂到南大	125
二、参与编辑《严复集》	134
三、整理点校《薛福成日记》	138
四、“文革”后期承担南大的外事接待	141
五、改革开放初期担任外国留学生工作	144
六、潜心培养研究生	154
 第六章 社会史研究五十载	158
一、涉足太平天国史研究	158
二、构建秘密社会史研究体系	162
三、系统研究民国时期的土匪	167
四、推动新时期的社会史研究	169
五、破解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	180

第七章 学术交流四大洲	189
一、美、加、日三国讲学	189
二、美国一年	197
三、西欧四国访问	206
四、两次访问澳洲	216
五、苏联解体前夕见闻	222
六、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228
七、推进中韩学术交流	233
附 录	236
后 记	255

第一章 早年求学之路

一、长江口的农家子弟

1933年8月14日,我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沙洲区合兴乡(镇)百顺圩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现在,从合兴镇到沙洲区,整个都已划归张家港市。我家世代务农,祖父母就是农民,育有两男两女:大姑母蔡桂珍排行第一,父亲蔡雄南排行第二,二姑母蔡秀珍排行第三,叔父蔡鹏南排行最末。祖父是村上一位耕地的好把式,他性格倔强,对子孙要求特别严格。父亲十七八岁就跟着祖父学耕田耙地,小时候常听父亲讲,祖父如何教他驾牛,如何教他把握犁耙,耕地的深浅稍不符合要求,就会挨老头子训斥,甚至用鞭子抽打。在祖父的严格训练下,我父亲后来也成为一名耕地能手。

我的家乡原是长江潮汛作用下,江心淤沙突涨,江泓改道,逐渐形成起来的大片沙滩地,所以称为沙洲。境内土地肥沃,普遍种植水稻、棉花、三麦(大麦、小麦、元麦)、油菜等作物。上世纪二十年代,社会比较安定,在我两个姑姑出嫁前,家中劳动力多,种的稻麦尤其是棉花收成好,所以祖父手里能逐渐积蓄一些钱,用来盖房置地,还能供我叔父上学读书。因为我家祖辈缺少文化,爷爷特别希望我叔父通过读书,将来成为在社会上受人尊敬甚至能够出名的文化人。他多次为我叔父挑着行李到无锡、上海考学堂,最终我叔父考上了无锡师范,圆了家里的心愿。叔父是我父辈里唯一的文化人,对我颇有文化上的

熏陶和学业上的激励,我在后面讲述自己的求学之路时再仔细谈谈。

当我叔父毕业找到教书先生的工作后,就立即回到我们村结婚成家。那时,我的两个姑妈已出嫁,我父亲也早已成家,祖父母的四个子女都羽翼丰满了,于是就决定将一个大家庭分为三个小家。我父亲是一家,因为他没有读几年书,只念过合兴小学,常年在家帮祖父耕地,所以除了多给一两亩地,还把家里的宝贝水牛留给了他,算是对长子的优待。叔父是一家,他主要靠教书为生,收入比较稳定,但也分得几亩水田。爷爷奶奶单立户口,又是一家,留有四五亩地作为生活依靠。

分家以后,我家虽然有五六亩地,还有一头水牛,算不上贫农,但处于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年代,社会动荡不安,生活相当困苦。我父亲除了将自己的几亩地精耕细作外,还经常要为别的人家耕田耙地,来养家糊口。母亲陶桂银大字不识一个,是纯粹的文盲。她为人勤劳慈善,待人宽厚,是村上有名的“老好人”,每天除了从事农业劳动,还要养儿育女,操劳一切家务。在解放以前的三四十年代,我的父母终年劳苦,以致积劳成疾,但我家的生活还是没有多少起色,过不上好日子。

我在家里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本来,哥哥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两三岁就夭折了,妹妹下面也有两个妹妹,同样是生病去世的。旧社会里农村缺医少药,小孩确实不易养活。我小时候也经常生病,比如疟疾、痢疾之类,长得面黄肌瘦的。我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得了痢疾,经常拉脓血,差不多一个学期没能上学,那时候感觉自己真的快要死了,后来我父亲用独轮车推我到四五里外的一个中医家治疗,总算活了下来。

我小时候七八岁就跟哥哥一起放牛割草,到十几岁的时候,使用镰刀割牛草的技术就很好了。农村里有许多土坟,上面长满了青草,我能像理发师给人剃光头那样,用锋利的镰刀很快把整个坟上的青草一扫而光。我现在八十多岁了,手指上至今还有割草留下的刀伤印痕。我的小学和初中阶段,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我们是放学赶快做完功课,大部分空余时间都要从事放牧劳动。有人把牧童生活描绘得自由自在,充满诗情画意,其实不

然。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夏天,在烈日炎炎之下,不仅要受汗流浹背的蒸熬,还要遭牛虻、蚊、虫的叮咬,甚至要面对毒蛇的袭击。尤其是雷雨季节,有时狂风突起,乌云滚滚,雷电交加,暴雨倾盆而下,我和哥哥要迅速把牛赶下河,让它在水里可以避免被雷击,我俩自己则穿上蓑衣,戴着斗笠,肩并肩地躲在岸边,眼前一片迷茫,吓得直打哆嗦。老奶奶在家里急得哭喊着:“求雷公雷婆,保佑我的孙子!”在初春、深秋的早晨,牵着牛在布满霜露的草地上,总是双脚冻得发麻,浑身发抖。《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记载,毛泽东当年见到牧童把自己的双脚踩到刚拉下的牛粪里,说是为了取暖。这在其他人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在我看来是十分真切的,因为我经常在天寒的早晨放牛冻得受不了。当然,在那春光明媚和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在野外放牧,也能骑在牛背上哼着小曲唱山歌,还能看到桃红柳绿、菜花金黄,以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样的美景。但总的来说,在艰难生活的压力下,放牧是很辛苦的。

二、小学时代“大踏步向前”

1940年我七岁,开始上家乡当地的合兴小学。这所小学坐落在合兴镇的西市梢,距离我家不过两里路,是1906年废除科举以后创办的新式学堂。我的父亲也曾在这所小学上过几年学。合兴小学的建筑很漂亮,校门是向南的西式门楼。进入校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厅,大厅上方挂着一个铜钟,该上下课时教工就鸣钟示意,伴随着“咚——咚——咚”铜钟响起,校园里时而喧嚷,时而又复归于安静。顺着大厅再往里走,到了大厅底部是学校的布告栏,张贴各种公示、通知和报纸,以后我再说说,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我就曾在布告栏的报纸上看到周恩来英俊潇洒的照片,印象深刻。从大厅侧面伸展便是教室,教室颇为宽敞,窗明几净,装上了当时少见的玻璃窗户。教室前后还有走廊,既能避雨又能蔽晒。校内有体育场,有翘翘板、滑梯等供我们玩乐的设施,每到下课,体育场上小伙伴们追逐打闹,快乐不已。在学校礼堂和校长教师办公室旁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栽有丁香、茉莉、红白玉兰、月季花、

美人蕉等多种花木。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很强,老师大多是中等师范毕业生,主要来自无锡师范、洛社师范、太仓师范和吴江师范等省内的师范学校。

我性格活跃,多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好。唱歌是我最早崭露头角之处。在一二年级时候,校里两位女音乐老师是从常熟城里来的一对姐妹,名叫朱明、朱英。她们的风琴弹得很好,上课的时候朱明老师经常把我叫到风琴旁,她弹琴我唱歌,给其他同学做示范,音乐考试的成绩也总是一百分。她非常喜欢我,对我说:“蔡少卿,你有一双亮眸子眼睛和出色的嗓子,唱起来声音清脆、调子准确,总得一百分。”现在想起来,这与我从小跟着父兄放牛,经常在旷野里恣意放歌,练就了一副好嗓子有关。

除了唱歌,我的记忆力也很好,脑子反应很灵敏。国语课文熟读了几遍就能成篇背出来,九九乘法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加减乘除算术题做得又快又好。在二、三年级的时候,我同座位的是一个姓陆的同学,他家在镇上开布店,家底富庶殷实,可是读书不用功,不写家庭作业。为了抄我的算术作业,每天早晨他都要带一副大饼油条或两块方糕给我吃。我每天早上只能喝两碗粥,一个农村孩子很少吃大饼、油条、方糕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约定每天早一点到学校,他抄我昨天的算术作业,我在旁边把大饼、油条或方糕吃完。

从那时起,贫富家庭学生的生活悬殊我已见到不少。下雨天上学,有钱人家的孩子,穿着胶鞋或用桐油油漆的高帮钉鞋,手中撑着深红色或黄色的油布伞,光鲜亮丽地走进教室来;而像我这样家庭一般的农村学生,头戴一顶斗笠或草帽,穿双破布鞋,还有的甚至光着脚,雨天内一路走到学校来,裤腿上沾满黄泥,脚上全浸湿,来到学校,一副狼狈样子。有时上午突然下起大雨,中午饭点时间富人家就派佣人带雨具来接孩子,有的还将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学校给孩子吃。而我家父母都忙着,无暇照顾我,我只能在学校饿一顿,默默地看着别人的家长人来人往,自己的同学大快朵颐。小小年纪,我已体会过饥饿的难受。

从小学四年级起,我的学习开始突飞猛进,在各项比赛中都能获得优异的名次。四年级那年,学校举办一次默字比赛,赛前语文老师让我和一位姓王的

同学到黑板前去默字,为比赛做准备。这位同学很厉害,他父亲是北洋大学毕业,在上海任地方法院院长,因抗日战争举家回到合兴镇老家,他自身的成绩也很好,一直是我学习上的竞争对手。在这次模拟默字中,我默写的速度和准确性都超过他,老师就高兴地对我说:“蔡少卿,你很有希望在全校的比赛获奖!”在全校正式比赛那天,规定默一百个字,我默对了九十九个,全校第一。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宣布了我的名次,给我发了三本练习本。在那个时代,对小學生而言这是很宝贵的奖励,也是我第一次在全校师生面前受到表扬,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让我印象更加深刻的是六年级时参加全区的演讲比赛。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因为蒋介石多年来一直提倡“新生活运动”,我们的常熟县沙洲区政府举办了一次全区中心小学参加的国语演讲比赛活动,主题是“爱国卫生运动”。比赛有十多所中心小学参加,每校派出两名代表。我们合兴小学在六年级学生中选中了,在五年级选了一名钱姓的学生作为参赛代表。在比赛之前,我俩严阵以待,紧锣密鼓地准备和训练。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就从床上跳下来,清醒清醒后就开始背诵讲演稿,并试着用普通话说出来。那时候的中小学里不像现在强制推广普通话,大家都说方言,我们苏南的方言和标准国语又差得太多,所以说这个比赛不仅是个演讲技巧的问题,还有国语标准发音的挑战。我还听说吃生鸡蛋可以润嗓子,于是每天早饭前就央求妈妈,用热水将自己家下的一个鸡蛋烫成半生不熟的状态,吃下去。自行练习了一段时间后,语文老师先让我在班上面对同学做讲演,又提出改进的意见。到正式比赛前一周,学校便要我住到姓钱同学的家里,他的父母都是金陵大学毕业的,父亲是我们小学后面大南中学的语文老师,母亲的普通话说得很好,每天上学前后由钱妈妈来指导和训练我们的讲演。

五月中旬正式竞赛的那天,校长和几位老师用自行车载着我俩从合兴镇到西港镇(西港镇是沙洲区政府的治所)区政府的礼堂。我第一次经历这么重大的活动,走进礼堂,里面已坐满了人,大多是各中心小学和西港镇当地中心小学的师生,还有区政府和各镇政府的代表,礼堂的前排坐满了打分的评判委

员。上午八时，比赛正式开始，以临时抽签结果排出各校代表上台演讲的次序，每人讲演一刻钟，大约到十二点钟结束。评选结果分个人和学校两类：个人成绩我与西港小学姓张的学生并列第一，各学校总成绩是西港小学第一，我们合兴小学第二。比赛结束后，我们小学的这几位师生到镇上的一家饭店就餐，校长陶松韵特意把我叫到他们那桌的酒席上坐下，满面笑容地对我说：“蔡少卿，真不错，为我们合兴小学争了光。”饭局中，校长和几个老师私下议论，西港小学在区政府所在地，校长范鸣岐是有名的老资格校长，不把他们评为第一名，面子上也说不过去。我小小年纪，不懂人情世故，也不懂这些话的个中含义，只顾得吃这顿难得的在区里饭店吃到的美味午餐。回校以后，我就成了一个“全校知名人物”。

我在小学阶段整体上是成绩优良、遵守纪律的学生，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每年的初夏时节，江南的桑树都开始结果实，个大、肉厚、色紫红、糖分足，酸酸甜甜的味道。那时候不像现在能买各种水果吃，都是自己去找些野果子吃。有一天，我在家里吃过午饭，与另外一个同学到野外爬到一株桑树上采桑葚吃，吃得嘴唇全是紫红色，脸上、手上也被桑葚汁染出了斑斑色块。我俩忘记了上课时间，赶到教室时已经上课了，一副狼狈的样子，被老师打了掌心，犯了一次违纪错误。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从小割草、放牛，家里没有什么文化的熏陶和学习的指导，却能和那些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同学同台去比赛默字、演讲，取得不错的名次，保持良好的学习成绩，现在回想起来是不容易的。我想，除了因为自己有些学习的天资和个人努力外，我叔父蔡鹏南对我的鼓励指导也是很重要的。我之前已经说过。叔父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从无锡师范毕业，听他说过，当年管文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丹阳地区有名的“管司令”，解放后任苏南行署主任和江苏省副省长）也在无锡师范读书，与一些进步学生成天满嘴的“马克思讲，恩格斯论”。我叔父虽然没有跟他们一起投入共产革命，但也受到过一些影响。他毕业后在常熟多所小学教书，还当过中心小学校长，为人正派，教学认真，培养出不少日后成名的学生，解放后被提升为中学教师。叔

父很喜欢我，每逢周末回家总要过问我的学习。三年级的时候我患痢疾，在家休养，他就帮我辅导了不少功课。有一次，他出了一个算术应用题给我做，我在家反复思考，终于把题目做出来了。他很高兴，鼓励我说：“像这样的题目你能做出来，保证你能大踏步往前。”所以，我叔父应该是我孩童时代在学业上最能激励和指导我的人了。

三、抗战沦陷时期的记忆

我童年上小学的几年是在抗日战争的后半段度过的。对于日本侵略中国，我在家乡所见所闻的事，至今还有清晰的记忆。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发生以后，消息很快传到了我们的农村，尤其8月13日日军武装进攻上海后，家乡不断有人高喊：“东洋人（日本兵）在海岸边上岸了，快逃难吧！快逃命吧！”引起了人们的恐慌。这年深秋的一天，雨下个不停，乡村的泥路很滑，可是泥路上满是逃难的人，有的向西，有的向东，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推着车子。这天早晨，我父亲把我们兄妹三个，用被子裹着，捆绑在独轮车的两边，推着我们向西边江阴方向逃难，走了几十里路，傍晚时才到达我的姑奶奶家。过了三四天，因她家食宿有困难，只得返回老家。经过几天的折腾，村民们逃难多走投无路，就在各自住宅后的竹林里挖地窖，用以避难。因为我们的家乡是水网地区，地势低洼，所挖的地窖都渗满了水，徒劳无用，大家只能听天由命。这年冬天，南京失陷，日军经常派飞机从上海沿长江一线向西飞行，有时飞得很低，还用机枪向地面扫射。我家在长江南岸，一天下午，我随祖父母去麦田里施肥，突然见三架日本军用机从东方飞来，只有几百米的高度，祖父母急忙带我趴在坟地边，飞机在我的头顶轰隆掠过，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一次很大的惊吓。

1938年，日军占领了我的家乡，在距我家不远的合兴镇上，驻扎了大约20个鬼子兵。他们还备有马队，不时外出巡逻扫荡，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他们扫荡的主要目标是共产党、新四军，因为当时常熟各地出现了许多以新四军为